

董 学 · 思 想 史 · 小 说 体

被告席上的 两千年

——董仲舒和批判他的人

王德生 著

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

被告席上的两千年

——董仲舒和批判他的人

王德生 著

德麦国际出版社 ·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· 2026

他被一代又一代最聪明的头脑，轮番审问了两千年。

这件事本身，比任何一句赞美，都更说明他是谁。

——「下帷者」系列之三。《一的总装师》读他造的系统，《下帷者》写造系统的人，这一篇，写审系统的两千年。

——题记



楔子 · 大愚

公 元前一二〇年前后，长安的朝堂上，一个年轻人
正指着一卷竹简，痛骂它的作者。

那卷竹简，说的是辽东高庙和长陵便殿那两场大火。写它的人推断：这是天在降灾，天意所指，是当天子的失德。年轻人读完，气得发笑。他站起来，当着满朝公卿的面，一句一句地驳，最后给了这卷东西一个盖棺论定的评语——

"大愚。"

蠢到了极点。写这种东西的人，愚不可及。

满堂的人点头。皇帝把这卷"大愚"之作的作者下了狱，判了死。

那个骂人的年轻人，叫吕步舒。

他不知道，他骂的这卷竹简，出自他自己老师的手。

他更不知道，他是一个长得望不到头的队伍里，第一个站出来的人。在他身后，排着两千年——排着王充，排着柳宗元，排着程颐、朱熹，排着王夫之，排着谭嗣同，排着鲁迅，排着顾颉刚。一代又一代最聪明的头脑，将轮番走上前来，指着同一个人，用各自的道理，骂他，驳他，掘他的墓，烧他的牌位。

被指着的那个人，叫董仲舒。

他是替这个帝国安放了"天"、安放了"大一统"、安放了三纲的人。他造的那套东西，压住了这片土地两千年。可也正因为它压得那样久、那样重、那样深，两千年里，凡是想动一动这片土地的人，凡是觉得胸口那块石头太沉的人，第一个要搬开的，就是他。

一个人被骂两千年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？

这样的命运，古今中外，也没几个人有。西方有个苏格拉底，被雅典人审了一回，判了死；可那是一场审判，一天就完了。董仲舒不一样。他这场审，是分期的，是连续的，是一代接一代、换着法子、隔几百年就重开一次的。他不是被审了一次，是被审了两千年，而且到今天，庭上还坐着人。

大多数人，是没有这个命的。绝大多数曾经显赫一时的人，死后几十年、上百年，就没人再提了，连骂都懒得骂。被遗忘，是历史给绝大多数人的、最普通的结局。能让一代又一代人，隔着几百年、上千年，还非要站出来，指着名字骂上一场的，两千年里，没有几个。

这命运里，藏着一个悖论：能被骂两千年，本身就是一种分量。那些转眼就被人忘掉的人，是没资格挨这么久骂的。骂声的长短，恰恰量出了那个被骂者，扎得有多深。你要恨一样东西恨上两千年，前提是，这样东西得压在你身上两千年——压得你喘不过气，压得每一代人都想把它掀开。骂得越久、越狠，越说明它压得越实、越沉。

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，是一场审判——一场开了两千年、到今天还没散庭的审判。被告席上，坐着董

仲舒。而证人席上，一个接一个，站起来的，是这个文明里最不肯认命的那些头脑。

让我们从第一个证人开始。从那个骂了自己老师、却不自知的年轻人开始。



一 · 学生

吕步舒是董仲舒的高足。

他学的，正是董仲舒那一套——《春秋》公羊学，天人相与，阴阳灾异。他学得好，好到能出仕，能在朝堂上议事，能被派去以《春秋》之义断天下的大案。他是老师那套学问，结出的一颗漂亮果子。

可当老师那套学问，以一卷没有署名的竹简，摆到他面前时，他认不出来了。

这才是这一幕里，最刺人的地方。

不是吕步舒背叛了老师。他是真的不知道。这卷推断灾异、影射天子的东西，落在他眼里，就是一堆牵强

附会、危言耸听的胡话。他按着自己所学的判断，觉得它"大愚"——而他所学的，恰恰是老师教的。

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荒诞的圆圈：老师教出来的道理，回过头来，被这道理教出来的学生，判了死刑。学生用老师给他的那把尺，量了老师自己写的东西，量出来的结果是——不合格，愚蠢，该死。

这是董仲舒遭遇的第一场批判。而这第一场，就已经点破了他日后两千年里，一切批判的一个共同的底色：

批判他的人，用的往往正是他给的东西。

这一点，值得多想一层。

吕步舒能站出来，义正词严地骂那卷竹简"大愚"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他心里有一套判断"什么是对的学问、什么是荒唐的胡说"的标准。而这套标准，正是董仲舒给他的——是他跟着董仲舒，一字一句学《春秋》、学公羊、学天人之际，才养出来的那副判断力。老师给了他一把尺，教会他怎么量东西的长短、辨东西的真伪。然后有一天，老师自己写的东西，被送到他面前，他拿起那把尺，一量——不合格。

他不知道，他手里那把尺，是老师亲手递给他的。

这就是一个真正深刻的思想家，最深、也最孤独的处境：他造出的那套东西，一旦成熟，就会长出自己的生命，会反过来，衡量、审视、甚至否定它的创造者。孩子会用父亲教的道理，来反驳父亲；学生会用老师给的方法，来推翻老师。这不是背叛，这是成长——是那套东西真的活了、真的能自己站起来走路的证明。

董仲舒最想要的，本就是让他的道理，脱开他这个人，自己活下去、传下去。他在帷幕后面讲学，一层层往下传，图的就是这个。可他大概没想到，这份"自己活下去"，是有代价的——那套活过来的道理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掉过头，量了他自己，还判了他一个"大愚"。

一个人最成功的创造，会反噬他。这是董仲舒的宿命，也是这场两千年审判，从第一天起就埋下的、最深的伏笔。

后世那些骂他骂得最凶的人，很多都是喝着他那套学问的奶长大的。他们反对他，可他们反对的方式、他们据以反对的立场，常常就来自他所开创的那个传统本身。一个思想家最深的影响，不在于有多少人赞成他，

而在于连反对他的人，都不得不站在他划出的地基上说话。

吕步舒后来怎样，史书语焉不详。他大概到死都不知道，自己曾经当众骂过的那个"大愚"，是恩师。

但他替后世所有批判董仲舒的人，做了一个不祥的开场：这个人，将要被他自己养大的传统，反复地审问。

第一个证人退下了。第二个证人，来自一百多年后的东汉。他是一个更可怕的对对手——因为他不是没认出董仲舒。他把董仲舒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，一件一件，拆。

他叫王充。



二 · 掘墓人

王充是会稽人，一辈子不得志。做过几任小官，都不长久，最后回了乡，闭门著书。他写了一部书，叫《论衡》。

"衡"，是秤。他要拿这杆秤，去称一称这世上所有他觉得称不住的话——称一称那些人人都信、却没人敢问一句"凭什么"的话。

而当时天下最人人都信、最没人敢问的一套话，正是董仲舒留下的那套：天有意志，天会感应，天用灾异谴告人间的君王。

王充把秤，压了上去。

他先问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：天，到底有没有"意志"？

董仲舒说，天像人一样，有喜怒，有好恶，会因为人间的失德而发怒降灾。王充说，不对。天是什么？天是自然。天地生万物，就像人身上会长出虱子——不是天"想"生万物，而是气一动，自然就生了。天没有嘴，没有心，没有那一套喜怒哀乐。把天说得跟个会赏善罚恶的君王一样，是人拿自己的样子，去套那个本无心的天。

这叫"天道自然无为"。

他再问第二个：灾异，真是天在"谴告"吗？

董仲舒说，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天先降灾异来警告。王充冷笑。他说：你看那些灾异，水旱、地震、日食，它们来的时候，讲过道理吗？桀纣那样的暴君在位，未必就多灾；尧舜那样的圣王当朝，未必就无难。灾异的来去，自有它自己的时节和缘由，跟人间君主的德行，根本对不上。硬要把每一场天灾，都派给一个人间的过错，是先有了结论，再去凑证据。

他还专门盯着"寒温"做文章。有人说，君主一发怒，天就变冷；君主一高兴，天就转暖——这是董仲舒那套"天人相动"的活标本。王充说：胡闹。一个人在屋里发多大的脾气，能让屋外的天气变冷？一国之君的喜怒，又凭什么能搅动整个天地的寒暖？寒来暑往，是四时的定数，不是哪个人的心情能拨动的。

他还有更釜底抽薪的一问。他说，就算退一万步，天真有意志好了——那么一个至高无上、无所不能的天，要管教人间的君主，会用"降灾异"这么笨的法子吗？

你想想，一个真正高明的天，若嫌君主做得不好，直接让他改了不就得了，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先降场水灾、再来次地震，还得指望人间有个像董仲舒这样的儒生，去把这灾异"翻译"成天意，君主才勉强看懂个大概？这么费劲、这么容易被误读、这么依赖一个中间人的沟通方式，配得上一个全能的天吗？

王充说：配不上。用灾异来"谴告"，恰恰说明这个"天"，是被人按照人间君臣那套打小报告、下批评的样子，给想象出来的。真正的天道，是自然而然、无声

无息的，它不谴告，因为它根本没有要谴告的那个"意思"。

这一问，比拆宇宙论更狠。它不只是说"天不会谴告"，它是说"谴告"这个想法本身，就透着一股小家子气，是拿人间官场的那套，去硬套一个本该无限高远的天。

一刀，一刀，又一刀。

王充几乎是有条不紊地，把董仲舒那座"天人感应"的大厦，从地基往上，一层层拆掉。天没有意志——地基没了；灾异不是谴告——梁柱倒了；寒温不由人事——连砖瓦都被他一块块起了下来。

这是董仲舒身后，遭遇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批判——不是学生的错认，而是一个清醒的头脑，睁大了眼睛，把他看穿，再动手拆。

可是，事情有一个惊人的转折。

就是这个把董仲舒的宇宙论拆得七零八落的王充，在另一个地方，却把董仲舒抬得极高。他排了一份文脉的谱系，说：周文王的文脉，传到了孔子；而孔子的文

脉，传到了董仲舒。"文王之文在孔子，孔子之文在仲舒。"在王充心里，董仲舒是接了孔子衣钵的那个人，是当世的文宗。

一边掘他的墓，一边给他戴上圣人的冠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其实不难懂。王充拆的，是董仲舒那套"天会说话"的宇宙论——那是他觉得最荒唐、最该拆的部分。而他敬的，是董仲舒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分量、作为一个替一代人立言者的地位。他反对董仲舒的"说法"，却不能不承认董仲舒的"重量"。

这也成了后世批判董仲舒的又一个母题：几乎没有人能把他一笔抹掉。骂他的人，往往一边骂，一边不得不承认——这个人，绕不过去。你可以拆他的某一间房，却拆不掉他整座城；你可以驳倒他的某一句话，却搬不动他在这个文明里占据的那个位置。

王充退场了。他是第一个掘墓人，也是第一个，一边掘墓一边行礼的人。

后来两千年里的批判者，几乎都逃不出王充定下的这个奇怪姿势——一边拆他的某一部分，一边不得不承认他另一部分的分量。恨他天人感应荒唐的，敬他"正谊明道"的骨气；骂他三纲吃人的，用着他打下的那套语言；把他从道统除名的，继承着他拧下的每一颗螺丝。掘墓的手和行礼的手，常常是同一双手。这是董仲舒这个被告，最古怪的地方：他的每一个起诉人，几乎都同时是他的某一部分的辩护人。

审判还长着呢。下一批证人，要等到七百年后的唐朝。他们要接着王充没做完的事——继续跟那个"有意志的天"过不去。



三 · 唐人的天

七百年过去，天下换了好几遍主人，董仲舒那个"有意志的天"，却还稳稳地压在人们头顶。皇帝下罪己诏，还是要向它请罪；史官记灾异，还是要照着它的谱去派对应的过失。王充拆过的那座大厦，被后人一遍遍地又补了起来。

直到唐朝，来了两个不信这一套的人。一个叫柳宗元，一个叫刘禹锡。

这两个人是至交，都因为一场失败的改革被贬到了南方的蛮荒之地，都在贬所里，抬头看那片"天"，问它：你到底管不管人间的事？

柳宗元先出手，写了一篇《天说》。

他把话说得又狠又冷。他说：你们抬头拜的那个天，那个日月星辰、阴晴风雨的苍苍者，它是什么？它不过是这世上的一样大东西，和瓜果、和草木、和人身上长的痈疽疮痔，是一类的。天地生出万物，就像一个烂了的大瓜上生出虫子——瓜不是"想"生虫，虫也不是天"派"来的。人在这天地间，繁衍、劳作、争斗，天看都不看一眼。

那么，人做了好事，天会赏吗？人做了坏事，天会罚吗？

柳宗元说：不会。天没有那个心思。你行善，是你自己的事；你作恶，也是你自己的事。指望天来替你主持公道，指望天因为你的德行降福、因为你的过错降祸——那是自作多情。功者自功，祸者自祸，跟天没关系。

这一篇《天说》，等于把董仲舒那套"天会赏善罚恶、会用灾异说话"的核心，连根拔了。天既然是"果蓏痈痔"，是无心的自然物，它就不可能是那个悬在皇帝头顶、会发怒会警告的审判者。

刘禹锡读了，觉得柳宗元说得还不够透，又写了《天论》三篇，往前推了一步。

他不满足于只说"天不管人"。他要说清楚：天和
人，到底各管什么。他提出一句话——"天人交相胜"。

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天有天擅长的，人有人擅长的。
论生养万物、论力气之大，人比不过天——这是天胜过
人的地方。可论是非、论治理、论用礼法把一群人组织
起来过日子，天却是懵懂的，这是人胜过天的地方。在
法度废弛、强凌弱、众暴寡的乱世，人们无处说理，就
会把一切归给"天命"，天的声音就大了起来；而在法度
严明的治世，一切是非都由人间的规矩来断，人就不再
事事去问天了。

所以，人越是把自己的事情管好，那个"天"就越退
场。天人感应之所以盛行，恰恰是因为人间的秩序还不
够清明，人们还需要一个"天"来替他们撑腰、替他们裁
断。

这话，比柳宗元更深一层。柳宗元说"天不管人"，
刘禹锡说"天该退场，让人自己来管"。两个被贬在蛮荒

的唐朝人，一南一北，遥遥地，接过了王充那把秤，又称了董仲舒一回。

在他们之前，还有一个唐朝人，从另一个角度，动过董仲舒的东西。他叫刘知几，是个史学家，写了一部专讲怎么写史的书，叫《史通》。

刘知几翻遍了历代的史书，越翻越气。他发现，从汉朝以来，史书里塞满了灾异——哪年哪月出了彗星，哪年哪月天上有两个太阳，哪年哪月地里长出了奇怪的草，然后，煞有介事地，把这些天象，一条条派给人间的某个过失、某场祸乱。这套记法，正是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落到史学里的产物：史官相信，天象和人事是一一对应的，所以要忠实地把灾异记下来，好让后人看出天意。

刘知几说：荒唐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些灾异和人事的对应，很多是史官事后硬凑的——先知道了后来出了什么乱子，再回头去翻，找一条时间上对得上的天象，往上一安，仿佛天早有预兆。这不是记录历史，这是编排历史。他要史书写实实在在的人事，别再拿这套天人感应的把戏，来糊弄后人。

一个史学家，从"怎么写史"这个角度，也捅了董仲舒一刀——他要把灾异，从史书里清出去。

到唐朝，董仲舒那个"天"，已经被从三个方向围攻：柳宗元说它无心，刘禹锡说它该退场，刘知几说它把史书都带偏了。三个唐朝人，接过王充那把秤，又称了董仲舒一回。

可是，唐人的这两篇雄文，动摇得了董仲舒吗？

没有。

天人感应照样流行，罪己诏照样在写，灾异照样在被解读。柳宗元、刘禹锡的清醒，只是几个孤独的头脑，在贬所里发出的声音，传不进未央宫，也压不过整个帝国照着董仲舒的图纸运转的惯性。

这暴露了批判董仲舒的一件难处：你可以在道理上驳倒他，却驳不倒那套已经长进制度、长进人心、长进王朝运转方式里的东西。道理是一回事，制度是另一回事。柳宗元、刘禹锡赢了辩论，却输给了那台还在轰轰运转的机器。

要真正撼动董仲舒，得等一批人——他们不在道理上跟他单挑，而是要造一座比他更大的庙，把他连人带庙，一起收编进去。

那批人，是宋朝的理学家。而他们和董仲舒的关系，是这整场审判里，最拧巴、最耐人寻味的一段。



四 · 骂得最凶的继承者

宋朝的理学家们，看董仲舒，是带着几分嫌弃的。

在他们眼里，董仲舒那套东西，太粗了。天会发怒，天会降灾，人身上有三百六十节去对应天上的日子——这些讲法，在讲究"心性义理"、追求精微的理学家看来，简直是村野之谈，上不了台面。他们要的天，是那个不动声色、至公至正的"理"，是"天即理也"的那个理，比董仲舒那个会哭会笑的天，高级太多了。

于是他们做了一件事：修家谱。

他们排了一份"道统"——一份圣人传承的谱系。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到孔子，到曾子，到子思，到孟子。孟子之后，这道统就断了，断了一千多

年，一直断到他们——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——接上。

这份谱系里，有一个刺眼的空缺：整个汉朝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董仲舒，那个替汉朝、也替整个后世帝制安放了内核的人，那个被王充称作"接了孔子文脉"的人——在理学的道统谱系里，没有他的位置。他被悄悄地，从圣人的家谱里，划了出去。

朱熹提起董仲舒，语气是很微妙的。他承认董仲舒有那么一两句好话——比如那句"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"，朱熹是击节赞叹的，说这是董仲舒平生最得力、最纯粹的一句。可一说到《春秋繁露》里那些天人感应、阴阳灾异的东西，朱熹就皱眉了，觉得芜杂，觉得驳而不纯，觉得董仲舒这个人"才"是有的，"学"却混了。

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批判：不是把你当敌人来驳，而是把你当一个"没学到家"的前辈，来惋惜，来嫌弃，来从谱系里除名。

想想那份道统谱系的跨度，就知道这一笔除名，除得有多决绝。从孟子，到二程，中间隔着一千三四百年。这一千多年里，读书的人千千万万，通经的大儒代代都有——汉有董仲舒、郑玄，唐有韩愈、孔颖达——可理学家大笔一挥，把这一千多年，判为"道统中断"的黑暗期，说圣人的真血脉，在孟子之后就断了，一直断到他们，才重新接上。

这是何等的气魄，又是何等的心思。他们要的，是让自己那座学问的庙，看起来像是越过了整个汉唐、直接从孟子手里接过来的——中间那一千多年，连同董仲舒，都成了不算数的、走了弯路的插曲。

可越是这样使劲地把董仲舒排除在外，越是暴露了一件事：他们心里，是把董仲舒当成了那个必须被越过去的人。你不会费心去"排除"一个无足轻重的人。正因为董仲舒在汉唐的分量太重、太扎眼，重到挡在了他们和孟子之间，他们才非把他挪开不可。除名这个动作本身，就是一种承认——承认这个人，站在了他们最想直接继承的那个位置上。

可是——

真正的反讽，在这里。

这些把董仲舒从道统里除名、嫌弃他粗浅的理学家，他们做的事，骨子里，是把董仲舒那台机器，接了过来，还拧得更紧了。

三纲，是董仲舒用阴阳编出来的。到了理学家手里，三纲没有被拆掉，反而被论证得比董仲舒更硬、更死。董仲舒说三纲"可求于天"，好歹还留着一层"从阴阳推导出来"的余地，仿佛还能问一句"这推导对不对"。而程颐说：君臣、父子，是"天下之定理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"。——"定理"两个字，连问一句的缝都堵死了。到了这一步，三纲不再是从某套语法里推出来的产物，它径直就是天理本身，是不需要理由、也不容置疑的终极。

大一统，还在。以经取士、以经义教化天下的那套自我复制的机器，还在，而且被理学做成的官学，铺得更广、扎得更深。

他们换掉了董仲舒那个"会发怒的天"，装上了一个"至公至正的理"——可那副主板，那套三纲大一统的装配，一颗螺丝都没动。他们做的，是给董仲舒那台旧机器，升级了一个更精密的内核。

所以，理学和董仲舒的关系，是这整场审判里最奇特的一幕：最想跟他划清界限的人，恰恰是继承他继承得最彻底的人。

一个继承者，要确立自己的了不起，最省事的办法，就是不认自己是从谁那里继承来的。理学家们把董仲舒从道统里抹去，恰恰因为，他们从头到脚，都是董仲舒的——他们抹去他的名字，是为了让自己那座庙，看起来像是凭空立起的、直接从孔孟接下来的，而不是站在一个“粗浅汉儒”的肩膀上。

骂得最凶、除名除得最干净的，正是继承得最全、拧螺丝拧得最紧的。

这一幕，董仲舒本人是看不到了。他若看得到，不知会作何感想——被自己的传人从家谱里除名，同时又眼睁睁看着他们，把自己造的东西，锻造得比自己想的还要坚不可摧。

理学家们退场了。他们没有削弱董仲舒，反而替他把那台机器，又焊牢了几百年。

要等到这台机器开始真正松动，要等到有人不再是"嫌他粗"、而是"恨他毒"，得再过五百年，得等到一个天崩地裂的年代，等到一个叫王夫之的人。



五 · 船山

明朝亡了。

清兵入关，山河变色。有一个人，不肯剃发，不肯出仕，躲进了湖南石船山下的深山里，一躲就是几十年。他把满腔的亡国之痛、满腹的学问，都倾进了笔下。他写经，写史，写得又多又深。他叫王夫之，后人称他船山先生。

一个眼看着一整个华夏被异族倾覆的人，回过头去，重新清算这两千年——清算这个文明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

清算到董仲舒头上，王夫之的笔，是带着火的。

他和理学家不一样。理学家嫌董仲舒"粗",是一种趣味上的嫌弃。王夫之恨董仲舒,是一种要害上的痛恨——他觉得,董仲舒那套"天人感应、阴阳灾异",是把儒学引上歪路的一个大关口。

在王夫之看来,儒家的正道,本该是讲人事的——讲人怎么修身,怎么尽伦,怎么在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里,把该做的事做好。天地是实的,是"气"化流行的,不是一个会因为人间君主打个喷嚏就变脸的、有喜怒的神。

可董仲舒干了什么?他把儒学,架到了一个虚妄的"天"上。他让人相信,天会因为政事的好坏而降下祥瑞灾异;他让治国的道理,去依赖一套看星象、占灾异的把戏。这一步,看似是给了皇帝一根管束的绳子,实则是打开了一个危险的口子——从董仲舒的"天人感应",往下滑一步,就是讖纬;再滑一步,就是各种借着"天意""符命"招摇撞骗的方术。汉朝末年讖纬泛滥、妖言惑众,王莽靠着"符命"篡了位,这笔账,王夫之要算到董仲舒开的那个头上。

在王夫之看来,这里头有一个可怕的滑坡。董仲舒的本意,也许是好的——他想用"天"来吓一吓皇帝,让皇

帝有所畏惧，不敢为所欲为。这是给皇权套绳子。可他没料到，一旦你承认了"天会用祥瑞灾异来表态"，你就打开了一个再也关不上的口子：从此，任何人，只要能造出一个"祥瑞"、编出一句"符命"，就能声称自己得了天意。绳子是双向的——它能勒住旧皇帝，也能替新的野心家，编出一顶"天命所归"的皇冠。

王莽就是这么干的。他遍地制造符命祥瑞，说天已经把命交给了他，然后堂而皇之地，把汉家的江山接了过去。往后两千年，多少造反的、篡位的、割据的，都学会了这一手——先给自己弄出一套"天命"的说辞，再动手。董仲舒想用来管君主的那套天意，反过来，成了每一个觊觎皇位者，最趁手的化妆品。

王夫之痛心的，正是这个。他觉得，一套本该让人挺直腰杆、老老实实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学问，被董仲舒掺进了这么多看天象、占灾异、造符命的东西，等于是把这个民族的头脑，往一个软塌塌的、遇事就往天上推、谁会编谁就能得势的方向，带偏了。这个偏，偏了两千年，偏到最后，偏出了一个被异族轻易倾覆的华夏。

亡国之痛，让王夫之把这笔账，追得格外狠。

他痛心的是：一套本该顶天立地、讲人的担当的学问，被董仲舒掺进了太多方术气、太多把人事推给天意的怯懦。人做错了事，不去老实地反省人自己，反而去看天上有没有出灾异——这是把人的责任，卸给了一个虚构的天。

这是一种从儒家内部发出的、极深的批判。王充、柳宗元是从"天不管人"这个角度拆董仲舒；王夫之则是从"儒家该不该靠天"这个角度，痛斥董仲舒把儒学带偏了。前者说他讲的天是假的，后者说他不该让儒家去依赖这个假的天。

可即便痛恨如王夫之，他也没有、也不能把董仲舒一笔勾销。

因为董仲舒那句"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"，那份要人只问该不该、不问利不利的刚正，恰恰是王夫之这样的人，在亡国之后死守气节、拒不降清时，心里认同的东西。骂他天人感应荒唐的人，敬他这一句话的骨气。

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被告：几乎每一个起诉他的人，翻遍他的全部，总能找到一两样，是自己不得不认下的。

王夫之在深山里，写完了他对这两千年的清算，死了。他没能看见，他痛恨的那套东西，还要再压两百多年。

而当它终于要被真正掀翻的时候，掀它的人，已经不是几个孤独的读书人了。是一整个走投无路的民族，是一个"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"，是黑云压城般涌来的、要把整座旧庙连根拔起的新时代。

那时候，批判董仲舒，不再是书斋里的辩论。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。



六·冲决网罗

十九世纪的末尾，这个古老的帝国，被西洋的坚船利炮，打得千疮百孔。

老庙要塌了。所有人都感觉到了。而在这塌之前的最后关头，围绕着董仲舒，发生了一件极耐人寻味的事——同一个时候，有人拼命想救活他，有人拼命想砸烂他。

想救活他的，是康有为。

康有为要变法。可在一个"祖宗之法不可变"的国度里，变法是要掉脑袋的。他得给"变"找一个古老的、神圣的靠山。他找来找去，找到了董仲舒。

他一头扎进公羊学，扎进董仲舒。他发现，董仲舒那套里，藏着他要的东西——"三统""改制"，说的是新王受命，本就该改正朔、易服色，"变"是天经地义的；"张三世"，说的是历史会从据乱世，走向升平世，再走向太平世，是往前进的。康有为如获至宝。他写《春秋董氏学》，把董仲舒高高地供起来，说孔子本就是一个"托古改制"的改革家，而董仲舒，是最懂孔子这层深意的人。

在康有为手里，董仲舒不再是那个僵死的、维护纲常的老古董，反倒成了变法维新的老祖宗、改革的旗手。他要借董仲舒的口，喊出"变"的正当。

这一手，其实极精明，也极无奈。

在那个"祖宗之法不可变"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年代，你若直愣愣地说"我们要学西洋、要变法"，会立刻被扣上"离经叛道"的帽子，寸步难行。康有为太懂这个国度了。他知道，要让"变"变得名正言顺，唯一的办法，是证明"变"本来就是老祖宗的意思——是圣人早就定下的、天经地义的道理。于是他反过来，从最古老的经典里，去挖"变"的根据。他挖到了公羊学，挖到了董仲舒。

董仲舒那套"三统改制"，说新王受命本就该改正朔、易服色，"变"是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；那套"张三世"，说历史是从据乱，走向升平，再走向太平，是一路向前、越来越好的。这些，正是康有为要的。他把它们高高擎起，向那些抱着"祖宗之法"不放的人宣告：你们错了，圣人从来不是叫你们守着老规矩一动不动，圣人是叫你们随着时势往前变的——这才是孔子、董仲舒的真意。

这是批判史里，一个极特别的品种：用复活来改造。康有为没有骂董仲舒，恰恰相反，他把董仲舒捧上了天。可他捧起来的，是一个被他重新裁剪过的董仲舒——一个只留下"变"与"进"，而悄悄放下了"三纲"与"尊卑"的董仲舒。他是在借董仲舒的躯壳，装进自己维新的魂。这也是一种深刻的"批判"——它不否定你，它改写你，它从你身上，只取它要的那一半。

而几乎在同时，另一个人，谭嗣同，却把董仲舒那套东西里最核心的一样——三纲——当成了必须第一个砸烂的枷锁。

谭嗣同写《仁学》，写得像一团火。他说，这两千年，是怎样的两千年？"二千年之政，秦政也，皆大盗

也；二千年之学，苟学也，皆乡愿也。"这两千年的政治，是秦的暴政；这两千年的学问，是把人驯成奴才的乡愿之学。而把暴政和奴学捆在一起、拧成一根绳子勒住所有人脖子的，正是那个"三纲"。

他喊出了一个词——"冲决网罗"。

他说，人被一层一层的网罗住了：君主的网，伦常的网，名教的网……而这些网里，织得最密、勒得最深的，就是三纲。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——它让臣民对君主绝对服从，让卑者对尊者绝对服从，把活生生的人，捆成了不能动弹、不敢反抗的顺民。它是这两千年里，一切奴役、一切不平、一切"以名教杀人"的总根子。

要救中国，就得先冲决这张网。

而这张网的设计者是谁？正是那个用阴阳把三纲编进了宇宙、让它"可求于天"、再被理学锻造成"天下之定理无所逃"的董仲舒。

于是，在世纪末的这一刻，董仲舒被劈成了两半。

康有为抓着他的一半——公羊、改制、三世——高高举起，当作变法的火把。

谭嗣同盯着他的另一半——三纲、名教——恨恨地，要把它连根烧掉。

一个人，同时是改革者要复活的祖宗，和革命者要砸烂的枷锁。这是董仲舒身上，最深的一道分裂，也是这个文明走到尽头时，自己内部那道最深的撕裂——它一边想借着老祖宗的名分往前走，一边又发现，正是老祖宗打的那套枷锁，锁死了它的手脚。

而这道撕裂，之所以能同时发生，恰恰因为董仲舒这个人，本就是两面的。

他造的那套东西，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。它一半朝前——"三统改制"讲变，"张三世"讲进，这一半，天生就带着"世道会往前走、旧的该让位给新的"的基因；它另一半朝后——"三纲""尊卑""定于一"，这一半，天生就是要把一切钉死、把每个人摁在他的位子上不许动。这两半，在董仲舒那里，本来是拧在一根绳上的：他要用"变"来给新王受命开路，又要用"不变"来保住天与三纲的内核。变的是皮，不变的是骨。

到了世纪末，这根拧了两千年的绳，绷断了。康有为抓走了"变"的那一半，谭嗣同盯上了"不变"的那一半。他们各自抓住的，都是真的董仲舒——只不过一个抓住了他朝前的脸，一个抓住了他朝后的脸。一个人被后世劈成两半，各取所需，恰恰说明，这个人身上，本就藏着那个时代最深的矛盾：既想往前，又被自己的根，死死拽住。

戊戌年，变法败了。谭嗣同本可以逃，他不逃。他说，各国变法，没有不流血的，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，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。他被杀在菜市口，临刑前，写下"我自横刀向天笑"。

那个想砸烂三纲的人，先被这套还没被砸烂的旧秩序，砍了头。

而那个想复活董仲舒的康有为，逃亡海外，日渐保守，最后成了拖着辫子、要保皇复辟的遗老。

董仲舒的这两半，最后都碎了。可他们合起来，替一个更彻底、更决绝的时代，做了预演。那个时代，不会再像康有为那样，想着从老祖宗身上借力；也不会再

像谭嗣同那样，孤身一人去撞那张网。那个时代，要把整座旧庙，连同董仲舒本人，一起，扔进历史的火里。

那个时代，叫新文化运动。它喊出的那个词，比"冲决网罗"更冷，更狠，也更痛——

吃人。



七 · 吃人

九一五年前后，一群更年轻、也更决绝的人，登上了历史的前台。

他们办杂志，写文章，一个个都像揣着火。陈独秀，李大钊，胡适，鲁迅，吴虞……他们受够了。受够了这个把国家拖到亡国边缘、却还在拿"三纲五常"压人的旧秩序。他们认定，中国要活，就得先跟这套旧道德、旧礼教，彻底决裂。

他们喊出了一个口号：打倒孔家店。

"孔家店"这三个字，指的不是孔子一个人，而是两千年来，以孔子的名义建立起来的那整套东西——三纲五常，名教纲常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而这套东西的总

设计师、总装师，正是董仲舒。是他，把孔孟那些还只是道德建议的东西，铸成了带宇宙论强制力的铁律；是他，把三纲编进了天，让它两千年拆不动。要打这个"孔家店"，董仲舒就是那个店的账房和梁柱。

批判的调门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四川有个吴虞，专门跟旧礼教死磕，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，痛斥"孝"和"礼"怎样被用来吃人、怎样把家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小朝廷。胡适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"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"。而那个"吃人"两个字，被另一支笔，写到了骨头里。

鲁迅写了《狂人日记》。

书里那个"狂人"，翻开一本历史来看。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，都写着"仁义道德"几个字。他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，看出字来——满本都写着两个字：

"吃人。"

这一刀，捅到了最深处。它说的是：这两千年，那些冠冕堂皇的"仁义道德"、那套神圣不可侵犯的"礼教纲

常"，底下藏着的，是一具又一具被它吃掉的人——被"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"逼死的寡妇，被"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"压垮的儿子，被"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"绞杀的臣子。那套让所有人各安其位、各守其分的秩序，是用一个个活人的血肉喂大的。

而搭起这套秩序骨架的，追到源头，绕不开董仲舒。

新文化的那些人，愤怒是有具体面孔的。他们眼前，是一座又一座贞节牌坊——那底下，是一个个年纪轻轻就守了寡、被"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"逼着熬完一生的女人。是一个个在"父为子纲"底下、连婚事都不能自己做主、连一句反驳都算忤逆的年轻人。是一个个在"君要臣死、臣不得不死"的名分底下，把屈辱当成本分、把服从当成美德的读书人。这套秩序最狠的地方，是它不光从外面捆住你，它还钻进你心里，让你自己觉得，被捆着，是对的，是天经地义的，是"礼"。

这就是"吃人"两个字最冷的含义：它不只是杀人，它是让被杀的人，含着笑，认了。

而让这一切"天经地义"起来的，正是董仲舒当年那一手——他把这套尊卑服从，从人间的一种安排，变成了天上的一条铁律。一旦"三纲"成了"天"的意思、成了"理"的本身，它就再也不能被质疑了。你不能问"凭什么"，因为答案是"天定的"。后世那一座座牌坊、一桩桩以名教杀人的惨剧，砖是宋明理学添的，可那个"把尊卑写进天、让人不敢问一个为什么"的地基，是董仲舒打的。

五四那一代人，是顺着那些牌坊、那些惨剧，一路往上追，追到了这个地基，追到了董仲舒。他们要烧的，正是这个地基。

这是董仲舒身后两千年，遭遇的最猛烈、最不留情面的一场批判。王充拆他的宇宙论，柳宗元驳他的天，王夫之痛他把儒学带偏——那都还是"说理"。而五四这一代人，是要"行刑"。他们不跟董仲舒辩论天有没有意志，他们直接宣判：你造的这套东西，吃了人，吃了两千年，现在，该拉出去，烧掉了。

董仲舒被架上了历史的火刑柱。

这把火，烧得有它的道理。三纲那套东西，确实在两千年里，被无数次地用来压迫、用来杀人、用来把人捆成不敢反抗的顺民。五四那一代人的愤怒，是真的，是替无数被这套秩序碾碎的人，喊出来的。

可这把火里，也有它的过头处。

把两千年的一切黑暗，全算到董仲舒一个人头上，把一套复杂的、既压迫过人也维系过秩序的东西，简化成一个"吃人"，是痛快的，却也是粗暴的。那个真实的董仲舒——那个也曾想给皇权套上一根绳子、那个说过"正其谊不谋其利"的董仲舒——在熊熊的火光里，被烧成了一个扁平的、纯粹的恶的符号。

批判到了这一步，已经不是在认识董仲舒了，是在用董仲舒，来烧掉一个旧时代。他成了那个时代要埋葬的一切的替身。

火，总会烧过头。烧过头之后，是灰烬，也是一种冷却下来的清醒。当愤怒的火焰稍稍平息，另一批人走了上来。他们不再喊"吃人"，也不再喊"打倒"。他们手里拿的，不是火把，是手术刀和放大镜。

他们要问的，不是"董仲舒该不该烧"，而是一个更冷、更釜底抽薪的问题：

——董仲舒讲的那个"天"，那套"五德""感应""符命"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它是天生的真理，还是……被人一层一层，造出来的？

问这个问题的人，叫顾颉刚。



八·层累

顾
顾颉刚是做学问的人。他不跟董仲舒动感情，他跟董仲舒动手术。

五四的骂声里，董仲舒是个"吃人"的罪人。可在顾颉刚这里，董仲舒连"罪人"都不是了——他成了一个"标本"，一个被放到解剖台上、要被一层一层剖开来看的历史标本。

顾颉刚有一个极厉害的想法，叫"层累地造成的古史"。他说，我们以为那些古老的、神圣的东西，是自古就有、天经地义的。错了。很多东西，其实是后人一层一层，累加上去、编造出来的——时代越往后，那个被追认的"源头"反而被推得越古老，故事被讲得越圆满。

真相不是越古越真，而常常是越古的说法，越是后人造出来的。

他拿这把刀，去解剖那套"五德终始""天人感应""符命祥瑞"的宇宙论。

他要问：这套东西，是怎么被一步一步造出来的？

他发现，所谓"五德终始"——用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，来解释王朝为什么该这家兴、那家亡——并不是什么亘古的天理，而是战国的邹衍搞出来的一套说法，后来被一代一代的政治需要，不断地改写、增补、坐实。哪个新王朝要证明自己"受了天命"，就往这套说法里，添一笔对自己有利的解释。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真理，它是被政治，一层一层喂大的。

而董仲舒的"天人感应"，正是这套被层累造出来的宇宙论里，一根极粗的梁。

顾颉刚这一手，比五四的火，更釜底抽薪。

五四说董仲舒"吃人"，好歹还承认他那套东西是"真"的、是有力量的——正因为有力量，才吃得了人。而顾颉刚说的是：你那套东西，压根就是编的。天没有

意志，是人给它编上的；灾异不是谴告，是人给它配对的；符命祥瑞，是一层一层，被想要它的人，造出来的。

他把董仲舒那座压了两千年的大厦，不是拆，而是——指出它本来就是纸糊的。指出它从来不是什么天经地义，而是特定的人，在特定的时候，出于特定的需要，一砖一瓦编造、加固、神化出来的一个东西。

这一刀最冷的地方在于：它连"愤怒"都省了。

王充驳他，柳宗元刺他，王夫之痛他，五四烧他——这些批判，无论多狠，都还带着温度，都还把董仲舒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，一个值得为之动气的存在。你要驳一个人，你得先承认他说的话有分量；你要烧一座庙，你得先承认那庙是神圣的、有魔力的，才值得一烧。愤怒，本身就是一种抬举。

而顾颉刚不给这个抬举。他不动气，不驳斥，不喊打倒。他只是平静地，把这套东西的来龙去脉，一层一层，摊在桌上：你看，这一层是邹衍加的，这一层是汉儒补的，这一层是为了给某个新王朝找合法性凑上去的……摊完了，那套曾经让人要么顶礼膜拜、要么切齿

痛恨的神圣宇宙论，就变成了一堆可以被镊子夹起来、放在灯下看清纹理的历史材料。神圣性没了，魔力没了，连让人愤怒的资格，都没了。

这是祛魅最彻底的一步。它不杀死神，它证明神从来就是人手做的泥胎。而一个被证明是泥胎的神，比一个被打倒的神，死得更透——被打倒的，还可能被人重新扶起来；被看穿是泥做的，就再也没人跪得下去了。

这是一种极冷静、也极致命的批判。它不动声色，却抽掉了这套东西最后的那一点神圣性。从此，"天人感应""大一统""三纲"，在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眼里，不再是需要顶礼膜拜、或需要拼命打倒的圣物或恶魔，而只是一段可以被冷静地考据、被摊在阳光下看清来龙去脉的历史。

董仲舒，从一个圣人（汉人眼里），到一个粗浅的前辈（理学眼里），到一个吃人的罪魁（五四眼里），最后，在顾颉刚这里，变成了一个历史的标本——一个被彻底祛了魅、可以平心静气地拿来研究的对象。

某种意义上，这是最温和的批判，也是最彻底的批判。它没有骂他，却把他请下了神坛，也请下了火刑柱，放进了博物馆的玻璃柜里。

到这里，两千年的审判，走过了它最激烈的阶段。学生的错认，王充的手术，唐人的清醒，理学的收编，船山的痛斥，谭嗣同的冲决，五四的火，顾颉刚的解剖——一浪接一浪，每一浪，砍的都是董仲舒身上不同的地方，每一浪，也都照出了砍他的那个时代，自己最在意、最痛、最想挣脱的东西。

现在，火熄了，刀也收了。是时候，问一个最难的问题了。

——这两千年，这么多最聪明的头脑，轮番来审他、砍他、拆他、剖他。可他，为什么还在？



九 · 平心

两千年的骂声散去之后，我们该怎么给董仲舒，定一个公道？

先说那些批判，哪些是对的。

它们大多是对的。

王充、柳宗元、王夫之说他那个"会发怒的天"是虚妄的——对。天确实没有意志，日食地震确实不是冲着哪个皇帝的失德来的。董仲舒那套"人副天数""同类相动"，以今天的眼光看，比附得粗糙，牵强得可笑。这一层，早该被拆，也确实被拆了。

谭嗣同、五四那一代说三纲吃人——也对。三纲那套"卑者绝对服从尊者"的东西，在两千年里，确实压死了无数人，确实把一个个活人捆成了不敢反抗的顺民。为这个愤怒，是正义的。

顾颉刚说那套宇宙论是被层累造出来的——还是对。它确实不是天经地义，确实是特定的人，出于特定的需要，一层层编出来、神化起来的。

这些批判，每一记，都打在了真的痛处。董仲舒不是无辜的。他造的那套东西，既有它撑起一个文明的功，也有它压垮无数个人的过。这笔账，该算的，都得算。

可是——

在把该算的账都算清之后，还剩下几件事，是那些愤怒的、痛快的批判，常常来不及看见的。

第一件：他那根勒住皇帝的绳子。

董仲舒的"灾异谴告"，在王充、柳宗元眼里，是荒唐的迷信。可换一个角度看：在一个皇帝就是最高、皇帝之上再无任何东西能管他的专制体制里，董仲舒硬是

造了一个"天"，安在皇帝头顶上——天比皇帝高，天会因为皇帝的失德而降灾，而替天解读灾异的，是读书人。这等于给了臣子一条唯一合法的、可以对皇帝说"你错了"的通道。日食了，地震了，儒臣就能站出来，借着天的名义，劝谏、批评、逼皇帝下"罪己诏"。

那些把这套"迷信"拆得干干净净的人，痛快是痛快了，可他们拆掉了这根绳子之后，并没有给这个体制，补上另一根能管住皇帝的绳子。他们证明了天不会谴告，却没能回答：那在一个没有天谴的世界里，谁来管那个最高的人？董仲舒那根绳子是纸糊的，可在很长的时间里，那是唯一的一根。

到了现代，当骂声渐渐平息，真有学者，肯回过头，替董仲舒的这一层用心，说几句公道话。徐复观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写《两汉思想史》，专门去看董仲舒那套"天人感应"背后的政治用意。他说，别只把它当迷信看——在一个皇帝权力大到没有边际的专制体制里，董仲舒硬是虚构了一个更高的"天"，把它悬在皇帝头上，本质上，是汉代的读书人，想给那头没有笼子的猛兽，套上一个哪怕是想象的笼子。这份"想限制君权"的苦心，不该被"迷信"两个字，一笔抹掉。

这是一种迟到了近两千年的、平心的理解。它不是要替董仲舒的粗糙翻案，而是提醒后人：在骂他"荒唐"的时候，别忘了看一看，他那份荒唐底下，藏着的那点不肯让皇帝为所欲为的心思。那点心思，在那个时代，已经是一个读书人，能想到的、最勇敢的东西了。

第二件：批判他的人，大多站在他铺的地基上。

这是这整场审判里，最深的一个反讽。

理学家把他从道统里除名，却继承了他的三纲，还拧得更紧。康有为要变法，第一个想到的靠山，是他。就连那些要"打倒孔家店"的人，他们之所以觉得非打不可，恰恰是因为董仲舒那套东西，实在扎得太深、太广、太久——你得先承认一个东西有那么大的分量，才会觉得非把它打倒不可。他们反对的激烈程度，本身就是他影响之深的证明。

一个思想家最深的成功，从来不是有多少人赞成他。是连反对他的人，都不得不站在他划出的那块地上，用他参与铸造的那套语言，来反对他。两千年里，凡是想动一动这片土地的人——不管是想修补它，还是

想砸烂它——都得先跟董仲舒打一场交道。他成了这个文明绕不过去的那道关口。

你说"天人感应"是假的——可你得先承认，这个文明确实用"天"想象了自己和宇宙的关系两千年，你才有得可驳。你说"三纲"吃人——可你得先承认，这个社会确实靠着这套尊卑秩序，组织了自己两千年，你才有得可恨。你说这一切是"层累造成"的——可你得先承认，正是这层层累加，垒起了这个文明大半的自我意识，你才有得可拆。董仲舒不在某一个具体的观点里，他在这个文明看自己、说自己、组织自己的那套底层语法里。你反对他，你也得用中文说话；而这中文里，早就渗进了他调过的味道。

这就是为什么，两千年的聪明人，轮番来砍他，砍了这么久，他还在。你砍不倒承重墙。你能在上面砸出无数的洞，能骂它挡了光、压得慌，可只要这座名叫"中华文明"的房子还立着，那面墙，就还在那儿。恨它的人，也得在它撑起的屋檐底下，说他们恨它的话。

第三件：能被审两千年，本身就是判词。

那些转眼被人忘记的人，是没资格挨这么久骂的。骂声的长度，量出了被骂者的分量。董仲舒被一代又一代最聪明的头脑，轮番审问了两千年——这件事本身，比任何一句赞美，都更说明他是谁。他是这个文明的承重墙。你可以恨一堵承重墙，可以在上面砸出无数的洞，可只要那座房子还立着，你就搬不走它，也绕不开它。

第四件：顾颉刚之后，还剩一个更难的问题。

顾颉刚证明了那套宇宙论是"编"出来的。这很了不起，也很彻底。可"编的"两个字，其实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。真正难的那一半是：一个编出来的东西，凭什么能管用两千年？

世上被编出来的说法多了去了，绝大多数，编出来没几天就散了，没人信，没人用。可董仲舒编的这一套，却被一个庞大的文明，信了、用了、活在里头两千年。这就不只是"真假"的问题了。一个假的东西，能有这么大、这么久的力量，本身就是一件需要解释的、了不得的事。

问"它是真是假"，是一种问法。问"它为什么假得如此管用、假得能撑起一个文明的秩序、假得让最聪明的人也要跟它缠斗两千年"，是另一种、也许更要紧的问法。前一种问法，把董仲舒送上道德或学术的审判台，判他有罪或无罪。后一种问法，把他放到解剖台上，不是要定他的罪，而是要看懂：一套东西，是经由怎样的工序，才被造得这样结实、这样耐用、这样拆不动的。

看懂一座压了两千年的大厦是怎么盖起来的——哪怕它是纸糊的——比证明它是纸糊的，要难得多，也有用得更多。因为下一次，当我们自己想给这片土地盖点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能从这座旧厦身上，学到的，正是这个：什么样的东西，能立得久；什么样的东西，一立久，就会把人锁死在里头。

所以，两千年审判的判词，也许既不是"有罪"，也不是"无罪"。

是"承重"。

他造的东西，有功有过，功过都大得吓人。它撑起过一个文明的秩序，也压垮过无数个人的一生。它给过皇权一根绳子，也给过百姓一套枷锁。它把一盘散沙拢

成了一个整的，也把这个整的，锁死在了一个走不出去的循环里。

给这样一个人定罪，或者替他翻案，都太轻巧了。真正配得上他的，不是骂，也不是捧，而是——看懂。看懂他到底造了什么，为什么造，用了什么料，留下了什么账。看懂那台机器的每一根梁、每一颗螺丝，看懂它撑起了什么，也压垮了什么。

两千年的批判者，每一个都看懂了他的一部分——王充看懂了他的天是假的，谭嗣同看懂了他的纲是毒的，顾颉刚看懂了他的道是编的。他们每一个都对。可要看懂那个完整的董仲舒，得把这两千年的骂声，全都收拢起来，一起听——听它们各自砍中了什么，也听它们各自漏掉了什么。

这，才是对一个被告席上坐了两千年的人，最起码的公道。

不是宽恕他，也不是清算他。

是终于，肯坐下来，把他，从头到尾，读一遍。



尾声 · 未散的庭

长安城南，下马陵。

董仲舒在这里躺了两千年。

两千年里，一拨又一拨批判他的人，从他的坟前经过。有汉朝的，有唐朝的，有宋朝的，有明清的，有穿长衫的，有剪了辫子的，有喊着"吃人"的，有拿着放大镜的。他们每一个，都是带着一肚子的不满、一脑子的道理，来审他、驳他、拆他的。

可传说里，连他们，经过这座坟的时候，也都下了马。

"下马陵"这个名字，说的正是这个：到了这里，得下马，得步行，得低一低头。哪怕你满心想的是怎么驳倒他、怎么砸烂他造的那套东西——你走到他跟前，还是不由自主地，放慢了脚步。

这大概就是一个被审判了两千年的人，能得到的、最奇特的敬意。不是崇拜，不是认同，而是一种——你绕不过他，所以你不得不郑重地对待他。你可以恨他，可你不能轻视他。

想想看，两千年里，有多少显赫一时的名字，早就风流云散，连一块像样的碑都没留下，更别说让后人下马了。可董仲舒不一样。骂他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，每一拨都想把他钉死、把他掀翻，可每一拨走到他跟前，脚步都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。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：要跟这个人算账，不能草草了事。他不是路边一块可以随手踢开的石头，他是这座大厦的一根承重柱——你憎恶这根柱子，你想拆掉它，可你越是认真地想拆，就越是不得不承认它有多重、扎得有多深。

下马，下的不是对一个圣人的马，是对一份沉甸甸的、绕不过去的分量，低一低头。这份分量里，有他的功，也有他的过；有他撑起的秩序，也有他锁死的两千

年。你没法只对着功下马、只对着过唾弃——你只能对着那整个的、复杂的、又功又过的董仲舒，郑重地，放慢脚步。

这场审判，到今天，还没散庭。

它也许永远不会散庭。因为审董仲舒，说到底，是这个文明在审自己。每一代人指着他问的那些问题——你为什么要造一个"天"来压我们？你为什么要用三纲把人钉在位子上？你造的这套东西，到底是护住了我们，还是困住了我们？——这些问题，问的是董仲舒，其实问的是这个文明自己的来路和出路。只要这个文明还在往前走，还在跟自己的过去较劲，它就还会一次次地，把董仲舒请回到那个被告席上，借着审他，来审自己。

只要还有人在想"我们这个文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"，只要还有人在追问"那些压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"，董仲舒就还会被一次次地，请回到那个被告席上。新的证人还会站出来，用新的道理，问新的问题。庭，不会散。

但也许，随着时间往前走，走上证人席的人，会越来越来地带着火，越来越多地带着一种平静——不是要

烧掉他，也不是要供起他，而是想看清楚他：看清楚这个在广川三年不窥园的少年，这个在未央宫一夜之间替一个帝国安上了心的老臣，这个被自己的学生骂作"大愚"、被两千年的聪明人轮番审问的人，到底给这片土地，留下了一份怎样的、沉得让所有人都搬不动的遗产。

被告席上，董仲舒坐了两千年。

他大概会一直坐下去。

因为一个文明，只要还没真正读懂自己的来路，就总得，一次又一次地，把那个替它安放了来路的人，请回来，再问一遍。

而每一次，走到他跟前，我们，都还是会下马。

（全文完）